

# 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 安全研究:问题与路径

刘艳芳<sup>1</sup>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 文章以语言安全为切入点, 从社会学、民族学和语言学跨学科视角探究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所反映的深层语言安全现实以及语言安全实现路径。研究发现, 民族地区旅游景区的主体语言缺乏规范, 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整体偏低; 民族地区主体语言、国际语言和民族语言权势不对称, 少数民族语言认同感不高; 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播意识偏弱, 文化传递效能明显偏低。加强语言安全规划、增强语言安全认知、提升语言文化认同感、健全语言翻译渠道, 是实现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语言安全的有效路径。本研究对于民族地区构建旅游语言景观生态、树立旅游形象、传播旅游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语言安全 民族地区 旅游语言景观 语言认同 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 H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22)08-0113-07

2022年1月, 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旅游业在传播中国文化、展示现代化建设成就、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重要作用, 并特别提及“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和化解风险”“意识形态安全底线”等核心概念。<sup>[1]</sup>这是继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来, 国家对旅游业安全观的进一步微观阐述, 表明国家对复杂多元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预见和研判。“语言安全本身不仅是一个自我特征明显的问题领域”<sup>[2]</sup>, 还是“贯穿于其他安全问题领域的要素和现实议题”<sup>[3]</sup>。无论从历时还是共时来看, 语言安全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也是现代旅游治理体系不可忽略的重要维度。

在文旅深度融合的新时代背景下, 旅游场景中形成的语言景观不仅体现创设者意识形态的语言实践, 更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纷繁复杂的语言安全问题。本文以语言安全为切入点, 从多学科视角探究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中的语码呈现所反映的深层次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安全现实, 并试图构建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安全实现路径, 以期营造良好的民族地区旅游形象, 讲好中国旅游故事, 推进旅游国际传播效力。

## 一、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安全内涵

自1997年Landry & Bourhis创造性地提出“语言景观”概念以来, 语言景观就成为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热点研究领域。近年来, 旅游语言景观也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在本文中, 旅游语言景观是指旅游景区各类指示牌、信息牌、警示牌、商铺招牌、广告牌等公共标牌上的语言呈现。国内对旅游语言景观的研究起步较晚, 具有代表性的是尚国文从宏观社会语言学视角探讨语言的商品化、语言表征的真实性、英语的霸权地位等问题。<sup>[4]-[5]</sup>其他学者大多从语码选择、译写规范、旅游开发和规划等视角进行零散研究。但研究成果总量较小, 研究内容和形式多重复, 且对语言内隐意义的分析不够深入。国外研究者则更多关

<sup>1</sup>作者简介: 刘艳芳, 博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跨文化交际。

注旅游语言景观的旅游学和社会学意义。Kallen 指出旅游语言景观至少发挥四种信息和话语功能:指示功能、行为调节功能、互动功能和认知功能。<sup>[5]271</sup>Leeman & Modan 认为旅游语言景观的象征性功能更为明显。<sup>[6]333</sup>Landry & Bourhis 则强调只具备象征功能的语言景观是缺乏生命力和可持续性的。<sup>[7]</sup>大多学者认为旅游语言景观体现了政府和当地社区、旅游业者和当地人的语言意识形态,<sup>[4]51[5]276[8]</sup>而不恰当的语言标识和规划不利于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复兴。<sup>[6]341[9]</sup>

总体来看,虽然国内外研究者都对旅游语言景观开展了相关研究,但鲜有聚焦于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安全问题。因此,从语言安全视角来探讨旅游语言景观,既有现实的迫切性,也有研究视角的创新性。

首先,有必要对“语言安全”这一概念进行界定。陈章太认为语言安全是指“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能够满足国家、社会稳定、发展的需求,不出现影响国家、社会安全的语言问题。”<sup>[10]</sup>本文的语言安全也不是狭义的语言自身的安全,而是广义的语言安全问题,涉及社会、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安全维度。基于此,本文认为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安全是指旅游语言景观中的语码选择和使用不仅应呈现应有的语言活力,也能满足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需求,不出现影响国家和社会安全的语言问题。

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安全既是安全领域的语言问题,也是语言领域的安全问题。旅游语言景观除了传递基本旅游信息外,还蕴涵丰富的权势信息、文化信息和身份信息,是“充满意识形态的内化景观”<sup>[11]</sup>。因此,旅游语言景观在编码、解码过程中承载的信息性和象征性使其成为影响非传统安全的隐性存在。旅游语言景观借助文本、语言和符号构建话语交际空间,不仅或显或隐地传达着创设者的语言态度和意识形态,也将游客纳入由创设者和管理者主导的话语秩序中,并影响着现实旅游情境中各方解读者的语言观、文化观和安全观。具体来看,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安全研究应关注以下研究维度:一是考察语码符号在旅游语言景观中的使用情况,探讨旅游语言景观中语言表达的合宜性、传意的准确性和使用的规范性;二是探究旅游语言景观中语码选择和使用所反映的交际主体的语言态度与行为,挖掘语言冲突、语言权势、语言认同等深层次意识形态问题;三是探讨旅游语言景观中的语言使用所呈现出的对民族文化认同、传承与传播的消极和破坏因素。

总的来看,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安全具有非显性、复杂性、地域性、动态性和内嵌性的显著特点。一、非显性:作为以标牌为媒介的可视化旅游实物,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旅游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而忽略其隐含的身份、地位、意识、权势、软实力、空间资源等象征意义。二、复杂性:在新的社会情境下,语言的社会功能、社会影响方式和社会价值都日益呈现多元变化的态势。语言强大的信息表征功能和文化符号功能,使其在旅游语言景观中的呈现方式和解读方式具有复杂性,并显现出一种长期交错的特点。三、地域性:由于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的地域文化、政治形态和社会认知,同一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表征在不同旅游区域的认知和感受是不同的。四、动态性: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高度发展,人们对不同语言、文化的接受度和敏感性越来越高,同时也在不断产生新的社会文化认知差异和隔阂。因此,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安全问题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点,时隐时现,时轻时重,时有时无。五、内嵌性: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安全问题不是一种独立的安全形态,而是通过社会、文化、资源、政治等安全领域得以呈现。

## 二、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语言安全的三维解析

“语言矛盾易于由少增多、由隐转显、由缓变锐,许多社会矛盾也可能用语言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sup>[12]</sup>以语言安全为切入点,从语言维、政治维、文化维三个层面解构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安全问题,不仅有助于通过微观旅游场景中具体、可视的语言现实来揭示民族地区隐性的语言资源现状和语言意识形态,也有助于引发社会各界对少数民族语言权益和语言生态的关注。

### (一)语言资源安全

语言资源安全,是指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使用域保持稳定,不存在语言活力下降、语言传承危机、语言污染严重等情形。作为重要的人文资源、社会资源和信息资源,语言资源已成为国家安全战略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源。

据统计,中国 56 个民族使用的 129 种语言,分属于不同语系或族群。<sup>[13]</sup>其中,汉语普通话是中国的通用语言和官方语言。我国《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早已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正确使用作了明确要求。然而,当前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中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语言安全问题。汉语的语言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错别字、拼音拼写错误和不规范汉字仍大量存在。这一问题在自下而上的私人标牌中尤其突出。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汉字以其特有的形、义、音等元素共同创造了汉字文化。“汉字既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也蕴涵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sup>[14]</sup>而作为一种汉字辅助读音的工具,汉语拼音的规范性对于传递中国文化、实现文化交流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从文化符号层面来看,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中的错别字和汉语拼音问题不可轻视。这也说明当地政府和管理部门对可能产生的语言本体安全隐患还缺乏足够的重视,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语言治理能力仍有待提升。二是外文挤占中文空间。随着英文成为现代化、全球化象征,英文符号和英文规范人为地被强化,并广泛运用于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如旅游景区路标、卫生间、指示牌等标牌中英文字母化现象严重;旅游商业区商店标牌英文大量使用,甚至出现英语单语标牌;旅游标牌使用汉语拼音书写人名时按照英语习惯名在前,姓在后;地名书写时中英文混杂。“维护语言的民族性,就是维护国家的尊严。”<sup>[15]</sup>西化中文和高频率的外文使用是对旅游国际化概念的狭隘认知,看似方便了外国游客,却损害了本国民众的语言认同感和民族情结,也是对母语语言主体地位的冲击。

另一方面,尽管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给予了少数民族语言较高地位,但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利益驱动下,少数民族语言式微趋势日益明显。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除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几种语言外,其他几乎都陷入衰落或濒危之中。<sup>[16]</sup>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更是少数民族语言危机的直观体现。民族地区旅游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连锁店、高端商铺、餐饮与住宿标牌一定有英文,但不一定有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作为濒危语言的东巴文是纳西族先民创造的文字,是国际上唯一的活象形文字。在云南丽江,东巴文在各类标牌中广泛使用,形成独特的旅游语言景观。然而,东巴文的运用往往流于形式,更多的是一种旅游商业符号元素,其装饰功能强于信息表征功能,并未真正显示出东巴文的语言活力。在贵州肇兴“侗乡第一寨”、西江“世界第一苗寨”,以及苗、彝、白、满等少数民族聚居的百里杜鹃景区,作为贵州主要民族语言的侗语、苗语和彝语的能见性和语言活力极低。贵州西江苗寨的语言景观标牌总体呈现汉语、英语、日语、韩语、苗语五种语言,汉语随处可见,其强势地位毋庸置疑,英语和其他语种次之,苗语则能见性最低,处于绝对弱势。少数民族语言在旅游公共空间中呈现的多寡、主次是其活力水平的重要标志。显然,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资源并不平衡,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明显偏低。这既有旅游经济效益、游客语言需求和国家语言政策的考虑,也是少数民族语言自身活力不足导致的语言竞争的必然结果。

## (二) 语言政治安全

语言政治安全,是指语言生态和谐,没有严重的语言偏见和语言歧视,语言竞争适度,未上升为语言冲突,社会语言秩序稳定可控。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可视性和凸显性与民众对语言的认同度成正比,因此旅游语言景观能够反映并影响特定语言的社会认同和地位。同时,旅游语言景观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经济驱动,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商业理性,因而在其构建过程中可能会淡化和掩盖语言权利、语言身份、语言意识形态等问题,而这些被忽视的问题则可能使文化身份和政治身份进一步被建构和强化,在有争议或冲突的社会空间尤其如此。旅游语言景观中“语言呈现的‘自然化’和‘合法化’有可能形成语言地位的不平等”<sup>[17]</sup>,而语言趋同可能会造成“少数民族语言价值的降低,从而使其进一步被边缘化。”<sup>[17]</sup>一旦某一群体语言出现语言认同问题,该群体为了维护自身语言权利、身份认同和相关利益有可能形成社会冲突,进而危及国家安全。

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中汉语占绝对主导地位,英语为第二强势地位,少数民族语言几乎处于隐性状态,属于次要元素。这既是社会语言竞争下的必然结果,也体现少数民族在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对本民族语言的疏离和低认同。贵州西江苗寨语言景观中出现苗语的标牌极少,官方标牌中少数地名、桥名标牌使用苗音汉字,而私人标牌中出现苗语更为少见,且苗文用法普遍不规范。西江苗语语言实体形式的普遍缺失反映了西江多语言生态系统中存在主体语言、国际语言和民族语言权势的不对称,多语言生态并不和谐,少数民族语言生存空间受到威胁。语码的选择、凸显方式和语言质量都显示出苗语的语言地位较低,社会认同感不高,语言自信不足。一方面,当地政府对苗文的政策推广有时流于形式,对苗文在旅游语言景观中的呈现形式和存在意义还需进一步提高认知;另一方面,当地旅游从业者和居民对苗语和苗语标牌的态度是矛盾而有差异的。笔者实地调研访谈时发现:有人认为苗语是本民族的语言,应该采取有效手段实现传承与传播;有人则对苗语缺乏自信,认为苗文在生活学习中缺乏使用场

景，在旅游业中的文化资本价值并不高；也有人认为政府对汉语的普及和推广影响了苗语的生存空间和传承。

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的形成融入了政策要求、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体现着特定地域社会群体对其语言图谱的社会认知和价值判断。因此，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所呈现的少数民族语言地位、价值认同和生存空间，以及语言的生态结构不容忽视。尤其少数民族在面对多语竞争中对本族语言的集体失语，将导致民族语言的持续弱化和边缘化。如果处理不好，容易引发民族矛盾和冲突，成为国家安全隐患。

### (三) 语言文化安全

语言文化安全，通常指语言文化生态和谐，不存在文化认同和文化遗产危机，现有文化传播机制能够确保不因语言因素引发各类安全问题。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标记，对文化认同、传承和传播的意义不言而喻。虽然少数民族语言 and 文化的复兴并非旅游语言景观规划设计者的首要目的，但旅游语言景观的最终呈现却不同程度地显示其文化意识和倾向，并影响游客的文化感知。

民族地区多元文化并存，语言的商品化使得作为文化代码的语言也成为可开发利用的资源。然而，在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中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往往只是强调其独特性、异域性的象征意义，通常属于“经济驱动的行为”<sup>[4]53</sup>，缺乏对其文化内涵的真正关注。云南丽江古城将东巴文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运用于旅游官方标牌和私人标牌，致力于把古城打造成以东巴文化为特色的民族旅游景点。然而，旅游从业者和纳西族居民都普遍认为标牌上的东巴文只是一种商品化符号，既未体现集科学、历史、美学、艺术于一身的东巴文魅力，也未展现以东巴文为代表的纳西文化内涵和价值。文化多样性的前提是语言多样性，民族地区旅游景观中少数民族语言的弱势将进一步削弱其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可以说，民族语言的失语将导致民族文化的失语，进而导致民族文化身份的隐退或消失。

另一方面，旅游语言景观是文化的重要承载者、阐释者和建构者，发挥着传输新概念和传播新话语的重要作用。然而，民族地区的旅游语言景观标牌中经常出现文化误译、漏译、错译等情况，这并不利于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如甘肃玉泉山景区“武侯祠”的译文“Ancestral Hall of Marquis”。武侯祠是为了纪念诸葛亮死后获得“忠武侯”的谥号而修建的，而Marquis在牛津词典里释义为侯爵，特指欧洲国家的贵族等级爵位。显然，“武侯”与Marquis无论是语义所指还是文化内涵都完全不同。这里的误译不仅体现旅游语言景观创设者对民族文化缺乏基本的严谨与认同，也不利于民族文化的重构与传播。贵州西江苗寨景区官方指示牌“鼓藏头家”译为“Religious Sacrifice Master's Home”，这种过于简化的翻译并未传递出苗寨精神领袖鼓藏头的丰富文化内涵和神秘的苗族鼓藏文化底蕴。这不仅使外国游客的文化体验感降低，也会影响游客对整体文化产品质量的期待和感知。事实上，到民族地区的游客普遍对具有显性文化表征的旅游景观持积极态度，认为其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真实的文化接触。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sup>[18]</sup>在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创设过程中，是否突显少数民族的文化真实和文化内涵，是否实现少数民族的文化群体意象和文化认同，是关系到民族文化的正向传承与传播，影响到民族文化自信和国家非传统安全的重要课题。

## 三、新时代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安全路径

继续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努力实现旅游业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是“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总体目标。<sup>[1]</sup>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是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的明确表述。<sup>[19]</sup>因此，如何防范和化解旅游语言景观建设中的语言安全风险，建设更加和谐安全的旅游人文生态环境，既是值得深入思考的文旅融合发展问题，也是具有现实迫切性的国家安全问题。在深刻认识当前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中存在的多维语言安全问题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为构建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安全图景提

出可行性路径。

### (一)加强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安全规划

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安全规划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既要准确真实的语言安全调查为基础，又要兼顾整体国家安全观、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文环境和旅游业态发展，还要充分考虑语言安全的复杂性、动态性和多维性。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安全问题是影响国家旅游形象和国家整体安全的因素之一，因此有必要从国家和地区两个层面开展系统全面、有总分的语言安全规划。

一方面，当前各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安全问题存在共性，比如错别字的使用、汉字和拼音使用不规范、外文凸显、少数民族语言缺失、翻译失真等。国家语委、国家民委和国家旅游管理部门可协同合作，基于新时代国家语言安全观，开展战略性、全局性的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安全调查，明确当前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存在的突出语言安全问题。只有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才能对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安全问题类型、特点和成因作出全局性的判断，并据此对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进行深层次的语言安全治理和语言安全建设。比如针对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制定相应的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文字使用要求和规范，逐步推进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的标准化建设；对不同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安全状态和语言活力进行等级评定，如消亡、濒危、不活跃、较为活跃等，并采取针对性的语言治理策略；创建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安全评价指标和评估机制，充分利用新技术对多模态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安全进行动态监测与评估。另一方面，不同民族地区，同一民族地区的不同区域和行业对旅游语言景观的认知和态度存在很大差异，其存在的语言安全问题也不尽相同。比如少数民族语言在老城区的语言活力和准确性明显高于新兴商业区；在语言景观建设早的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能见性和信息功能性较高。早在2008年颁布的《丽江市旅游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内应当使用东巴文字”<sup>[20]</sup>，这对于濒危语言东巴文的保护和传承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因此，在积极配合国家旅游语言景观语言安全规划的同时，应该鼓励各民族地区进一步因地制宜地开展灵活的、有针对性的区域语言安全治理和建设，从而实现兼顾总体和局部，统筹和细分的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安全规划图景。

### (二)增强当地政府和旅游管理部门的语言安全认知

在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建设中，当地政府普遍关注发展旅游经济、维护民族平等，而对语言安全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和认知。由于语言景观不提供设立者与阅读者面对面的交流，也不提供反馈信息，因而容易导致两者在认识上出现偏差。<sup>[21]</sup>如果政府和旅游管理部门自身不具备语言安全认知，就不会有意识地去了解旅游语言景观设立者的使用态度和阅读者的认知反应，更不会开展有效的旅游语言景观语言安全规划和治理。2022年1月颁布的《丽江市旅游条例》规定“设置旅游指示标识，应当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鼓励景区(点)同时使用规范的少数民族图文设置服务标识。”<sup>[22]</sup>虽然条例中提及旅游场景中的语言文字使用规范问题，但表述过于笼统、模糊和简单，且规定的形式大于内容，并未涉及语言文字质量、语言呈现方式、语言安全等实质内容。2019年7月，三亚率先提出建设中国首座语言无障碍国际化城市，构建公共空间多语言标识牌体系和多语种旅游服务体系，<sup>[23]</sup>这体现了三亚奋力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心，但其过于强调语言的交际价值而忽略了语言的安全性，难免令人担忧。

旅游语言景观标牌上的语码选择、排列顺序、凸显性“往往都深藏着语言政策和规划的含义，绝非随意的选择。”<sup>[24]</sup>中国是有着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地区的旅游语言景观安全问题复杂而多样，这就更需要当地政府和旅游管理部门不断增强语言安全意识，防范语言安全风险，并要自知自觉地将语言安全意识深植于政策法规和政府宣传中，从而对旅游语言景观设立者、旅游从业者和当地民众发挥明确的正向引导作用。

### (三)提升旅游从业者和当地民众的语言文化认同感

旅游从业者和当地民众在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旅游语言景观建设主要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广和官方行为，其推广效果存在局限性。如果仅仅依靠官方行政手段强制推行，而旅游从业者和当地民众缺乏对民族语言

的真正认同，那么旅游从业者迫于官方政策要求，可能更多关注的是民族语言的商业象征功能，而忽略其语言文化信息功能；当地民众由于缺乏内驱力则会忽视，甚至无视旅游语言景观中本族语言的真正价值和意义。这些都无益于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的维持和语言资源的传承。

可见，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安全建设同样依赖于旅游从业者和当地民众对民族语言的认同和自信。语言是民族的象征与标志，也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遗产的媒介。因此需要旅游从业者和当地民众从国家、民族、社会、文化、教育、经济等多维度增强对民族语言文化的真正认同感与自豪感，增强传承和传播民族语言的意识，树立语言传承的民族情怀和责任担当。同时也要客观意识到，“经济获益是居民文化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sup>[25]</sup>因此要提升语言和文化认同，仅仅依靠政策和说教是不够的，需要提升本族语言在民众的社会生活和商业中的实际转化价值，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语言认同和传承的内在自发性和积极性。如果旅游从业者能通过使用民族语言吸引游客，提升品牌价值而盈利，民众体会到本族语言对其生活、工作、学习、民族身份和地位的附加价值，那么他们自然就会有学习、掌握和使用本族语言的内驱力。

因此，在旅游语言景观建设中，政府除了通过政策和行政手段引导民众对本族的语言认同和语言自信，同时还可与时俱进、积极采取灵活多变的形式提升民众对本族语言使用的参与度和话语权。比如政府可利用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虚拟社群等新媒体平台，广泛征集旅游从业者、当地居民、游客对旅游语言景观建设的意见，积极构建多元主体协商的旅游语言景观互动机制。在提升少数民族语言能见性的同时，帮助民众树立语言文化自信，从而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可持续语言人文生态。

#### (四) 健全和规范语言翻译渠道

近年来，国家积极扶持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推动文旅提质升级、品牌打造和宣传推广，这为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巨大发展空间和潜力，同时对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翻译质量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家的整体形象，也可能造成语言安全隐患。这里的翻译包括汉语译成少数民族语言，以及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译成外语。

旅游语言景观的创设者主要是指政府部门、旅游景区和旅游从业者。笔者多次实地调研发现，民族地区官方标牌的译文质量明显优于私人标牌，景区译文优于商业区，私人标牌中生硬直译、滥用音译是突出问题，官方标牌中同样存在翻译失真和争议点。对于旅游语言景观的翻译问题，绝大部分旅游从业者关注的并不是翻译是否言之有物、言之可信，而是翻译是否符合政策要求，以及语言符号的象征性能否带来商业利益。为了降低成本，他们往往聘请低价翻译或自己随意翻译。因此，作为旅游语言景观整体规划的一部分，民族地区当地政府可以针对旅游语言景观的翻译现状和翻译渠道进行广泛调研，探究政府、旅游景区和旅游从业者在旅游语言景观翻译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典型问题及其成因，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来健全和规范旅游语言景观中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的翻译渠道。在笔者实地调研过程中，曾经有旅游从业者提出，针对旅游语言景观中常见的、使用频率高的字体和文字表述，政府是否可以提供少数民族和外语译文版本，供旅游从业者免费选择和使用；也有旅游景区管理人员提出，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人才和外语翻译人才的匮乏是不可忽视的事实，建议政府有效整合翻译资源，采取政企、政校合作等方式开拓灵活多样、规范可信的翻译渠道和翻译平台，为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翻译质量提供强大支持和保障。

## 四、结语

在整体国家安全观和文旅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安全问题值得关注。在多民族聚居、多语种共存的场域里，旅游语言景观不仅以丰富多样的文本形态提供信息服务，也具有构建语言生态、表征语言身份、彰显文化意象的象征意义。本文以语言安全为切入点，从语言维、政治维和文化维的三维层面深入探究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所反映的语言安全现实，进而探寻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语言安全的实现路径。总体来看，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的语言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整体偏低；汉语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少数民族民众对本族语言普遍缺乏认同感；少数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播意识整体偏弱。因此，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建设应兼顾语言资源符号的人文性、经济性和安全性。只有客观审视民族地区旅游语言景观的

---

语言安全现实, 加强语言安全规划, 增强语言安全认知, 提升语言认同感, 健全语言翻译渠道, 才能构建民族地区健康和谐的旅游语言景观生态, 对内实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和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对外构建中国旅游大国形象, 实现旅游文化有效传播。

####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 (2022-01-20) [2022-03-20].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20/content\\_5669468.htm](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20/content_5669468.htm).
- [2] 郭继荣, 杨亮. 国内语言安全研究述评[J]. 情报杂志, 2021(6):95-101.
- [3] 沈骑. 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语言规划研究:问题与框架[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4(5):103-112.
- [4] 尚国文. 宏观社会语言学视域下的旅游语言景观研究[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3).
- [5] Kallen, J. Tourism and representation in the Irish linguistic landscape[C]//E. Shohamy&D. Gorter(eds.). Linguistic Landscape:Expanding the Scenery. New York&London:Routledge, 2009.
- [6] Leeman, J. &Modan, G. Commodified language in Chinatown:A contextualized approach to linguistic landscape[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009(3).
- [7] Landry, R. & Bourhis R. Y.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An empirical study[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7(1):23-49.
- [8] Moriarty, M. Indexing authenticity: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an Irish tourist tow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15(232):195-214.
- [9] Cenoz, J. & Gorter, D.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minority languag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2006(1):67-80.
- [10] 陈章太. 语言资源与语言问题[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9(4):1-7.
- [11] Rubdy, R. & Said, S. B. Conflict, Exclusion and Dissent in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M].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15.
- [12] 李宇明. 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若干思考[J]. 南开语言学刊, 2011(1):1-8.
- [13] 孙宏开, 胡增益, 黄行. 中国的语言[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 [14] 刘翠霞. 汉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N]. 光明日报, 2020-09-25.
- [15] 蔡基刚. 英汉词汇对比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254.
- [16] 张弘. 大部分“中国语言”接近濒危[N]. 新京报, 2008-01-19.

- 
- [17]White,P.The Social Impact of Tourism on Host Communities:A Study of Language Change in Switzerland[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1974:26.
- [18]雒树刚. 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N]. 光明日报, 2020-12-14.
- [19]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 (2020-10-29) [2022-03-02]. <http://cpc.people.com.cn/n1/2020/1029/c64094-31911510.html>.
- [20]丽江市旅游管理暂行办法[EB/OL]. (2008-08-22) [2022-03-21].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1.asp?id=267776](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1.asp?id=267776).
- [21]Spolsky,Bernard.Prolegomena to a sociolinguistic theory of public signage[C]//Ahoamy,E.,Gorter,D.Linguistic Landscape:Expanding the Scenery.New York&London:Routledge,2009:25-39.
- [22]丽江市旅游条例[EB/OL]. (2022-01-25) [2022-03-28]. <http://www.lijiang.gov.cn//ljsrmzf/c102156/202201/a94bbc56e87948a992ac680bda07b999.shtml>.
- [23]三亚率先建设中国首座语言无障碍国际化城市[EB/OL]. (2019-07-14) [2022-03-14].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9017982390947952&wfr=spider&for=pc>.
- [24]尚国文, 赵守辉. 语言景观的分析维度与理论构建[J]. 外国语, 2014(6):81-89.
- [25]肖潇, 张捷, 卢俊宇. 居民对遵义红色旅游商业街中书法景观的认同度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8):1080-1086.